

萱野长知与居正的交往初探

袁 晨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ayano Nagatomo and Chū Cheng

YUAN Chen

Abstract

The 1911 Revolution is deeply related to the Japanese supporters. Kayano Nagatomo (1873-1947)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Japanese people who supported the 1911 Revolution. He developed friendships with man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and especially had a deep contact with Chū Cheng (1876-1951), who was a close associate of Sun Yat-sen in the revolution. Kayano and Chū got to know with each other after the Tongmenghui's establishment in 1906. After the Mukden Incident launched by Japanese military, Kayano went to China as a secret emissary of Inukai Tsuyoshi (1855-1932), the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and had communication with Chū Cheng in order to find a peaceful solution to avoid military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but in vain eventually because of the obstruction of Arm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ayano Nagatomo and Chū Cheng and points out how it influenced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Key words: 辛亥革命、日本人、萱野長知、居正、「滿洲事變」調停

一、引 言

清末民初的有识之士在寻求救国之道时，发现向同样使用汉字且逐渐强大起来的近邻日本学习是一条了解西学和观察现代化世界的捷径。从此，以中国大陆为源头向日本输送文明的形势逆转，日本开始大量地向大陆方向输出文化。在此阶段，尽管日本为满足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积极向中国延伸扩张力量，但以留日学生为媒介，日本向中国输出了新词语、新思想，日本人还援助孙中山及以留日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党人发动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腐朽的满清。日本虽然不断扩大在中国的利益范围，但从两国政府的角度出发，中日两国关系还未到剑拔弩张的地步。而随着主张通过“霸道”征服整个中国的势力主导日本，企望通过“王道”在中国获得正当利益的论调的式微，两国间爆发全面战争，走向完全对立面的中日两国关系彻底破裂。

就在中国两国关系不断变迁的历史过程中，萱野长知和居正这两个分别来自日中两国的人物，却自始至终坚持着个人理想以及两人间的友情。两人年纪相仿，交往时期始于辛亥革命时期，贯穿至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后，跨越近半个世纪。两人均是对本国政治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两人的交往也对中日两国的发展产生了不少影响。

近年来，对两人的研究逐渐引起学界的注意。研究萱野长知最为系统的资料是日本女子大学名誉教授久保田文次编著的《萱野长知研究》，该书为久保田文次教授在高知当地学者崎村义郎所著《中国革命支援的先觉・萱野长知传》的基础上，对原有资料进行重新梳理之后完成的著作。该书对萱野长知的出身及学习成长过程、参与辛亥革命的情况、与中国友人的交往、为中日两国和平所做的工作、在日本国内的政治活动以及关于他的诸多逸事进行了全面、详实的叙述。此外，久保田文次教授还著有《萱野长知・孙文关系史料集¹⁾》，收藏有居正写给萱野长知的十三封信，以及萱野长知与曾担任犬养毅首相秘书、同时也是犬养毅之子的犬养健之间的往来密电等重要的第一手资料²⁾。与“九一八事变”后萱野长知参与的和平调停工作相关的第一手资料有前文提到的密电以及登载于《中央公论》杂志1946年8月号的《犬养密使・萱野长知日志》，研究论文有《犬养毅的“和平”试探与“五一五”事变》（李吉奎，《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萱野长知与两次中日和平调停》（陆伟，《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犬养毅与九一八事变》（黄自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1996年6月）。目前为止对萱野长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在“九一八事变”后来华从事的调停活动，在关于辛亥革命的论文中也偶有涉及萱野帮助运送武器等内容。而对居正的研究多集中于他在辛亥革命期间在湖北的活动，此外还有许多关于居正法律工作与思想的论文。居正留有許多笔墨于世，如《辛亥札记》、《梅川日记》、《梅川谱偈》等。可见两人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但专门叙述两人交往的著述并不多见。近些年陆续有萱野与居正两人的部分书信公诸于世，对研究两人关系有重要意义，笔者在本文中也有引用。

1) 高知市民图书馆出版，2001年。

2) 收录于陈三井、居蜜合编：《居正先生全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

笔者希望通过两人持续几十年的关系发展过程的研究，来探讨两人将个人私谊与国家关系及利益结合起来的交往之道。同时，探寻两人的交往对两国关系及政局有哪些影响。在本文中，笔者将介绍两人关系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片段，并重点分析在“九一八事变”后，萱野来华与居正进行和平调停工作期间两人的交往，并以此为起点开始对两人交往的深入研究。

二、萱野长知与居正的相识及两人关系的发展

萱野长知1873年出生于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发祥地之一——土佐³⁾，他自幼学习西方思想与科学技术，对自由民权思想耳濡目染。后受一桩热血青年暗杀官员未遂事件的牵连，于1892年首次前往中国⁴⁾，并于1895年在香港结识了孙中山⁵⁾。自此萱野长知开始了其支持中国民主革命的生涯。萱野间接帮助或直接参加过广州起义、武昌起义、二次革命等革命活动，还在阳夏保卫战中与战时总司令黄兴共同起居，在孙中山临终前陪伴其左右。萱野与中国渊源之深由此可见一斑。除此之外，在“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爆发，中日两国关系紧张，面临全面战争之时，他还曾受日本政府高层之命，多次以密使的身份前往中国进行斡旋活动，并通过当时中国政府内一些当权者、也是他在辛亥革命时期结识的同志的关系开展和平调停，企求避免中日两国间的战争，以实现其理想中的日中友好、共同繁荣。尽管最终均以失败告终，但其怀抱自由民权思想、主张日中友好共同繁荣的“大亚洲主义”，并自始至终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懈奋斗的精神理应受到肯定。

而作为萱野长知养女萱野华惠⁶⁾之生父的居正，与萱野长知既是革命的同志，同时也是要好的朋友。居正是湖北人，年纪比萱野小三岁。早年借债留学日本，先后在政法大学、日本大学学习政治及法律。居正是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在湖北革命党人中，真正具有全国影响的首推居正”⁷⁾。居正先后参与了武昌起义、“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革命活动。孙中山去世后，作为“西山会议派”的代表人物的居正主张“反共清党”，后因为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被囚禁，直至“九一八事变”前夕才被释放。释放后的居正即与以时任日本首相犬养毅的密使的身份来华的萱野长知，就“九一八事变”的和平解决方案进行了协调，但终因日本“军部”的干预而化为徒劳。居正曾长期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为中华民国的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于萱野长知与居正结识的具体时间，目前没有准确资料佐证。久保田文次教授在《萱野长知研究》一书中指出两人结识的时间大体为同盟会成立至中华革命党时期。根据《居正传》的说法，居正在同盟会成立后，“还代表革命领袖与犬养毅、萱野长知等日本友人联系，争取他们的支

3) 今日本高知县。

4) 崎村义郎著，久保田文次编：《萱野长知研究》，高知市民图书馆，1996年。

5) 《列传·萱野长知》，东亚同文会编：《续对支回顾录》，原书房，1973年，1187页。

6) 本名居瀛久（1914-1969）。

7) 章开沅：《居正传》序言。林济：《居正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持”⁸⁾。但以上说法都无法作为判断两人结识时间的依据。居正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即公元1905年夏赴日本东京留学，进入法政大学速成科学学习⁹⁾。到达日本的居正很快受革命宣传的影响，开始随黄兴、宋教仁等人从事革命活动。而此时的萱野长知正在随“满洲义军”在中国东北参加日俄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民间扩张主义右翼团体“玄洋社”组织“满洲义军”，雇佣中国当地被称为“马贼”的骑马武装盗贼集团，从事对俄国军队的“扰乱敌后”、情报侦察的活动，配合日本正规部队作战，直至1905年10月战争结束。根据《木堂先生与东亚问题》所记述的萱野在犬养毅追悼座谈会上的谈话来看，萱野本人曾明确表示其参与同盟会活动的时间是明治39年即1906年，那之前他在广东。关于1905年之后萱野与革命党人有关活动的最早记述来自于《宋教仁日记》：

“(1906年3月)十日晴

…

下午，功课毕，至《民报》社。遂至芝区。芝桥大光来。时宫崎氏已在，晤得萱野长知者，日人，而操华语，服满洲装，殆不辨其为日人焉。…”¹⁰⁾

由此可见，萱野长知开始参与同盟会的活动是在1906年3月10日之后。从1906年初回到日本至1907年3月为负责潮州起义武器调运工作前往中国，在此期间萱野与同盟会人士交往频繁。1906年8月，萱野与宫崎滔天等人共同创刊《革命评论》以支持革命党人活动。全身心投入编辑工作中的萱野曾经十天未踏出编辑部一步。在萱野本人所作的编辑日志中，经常会看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炳麟等革命者来到“评论社”，双方饮酒、会谈、聚餐的内容¹¹⁾。据此可以判断萱野与同盟会高层人士在此期间有着密切的交往。此时的居正在同盟会内十分活跃。1905年7月30日召开的同盟会筹备会，居正便是参会的70余人中的一名¹²⁾。尽管居正并没有在同盟会中担任任何正式职务，但在同盟会成立后，居正很快成了孙中山最亲信的核心分子之一¹³⁾。从1905年夏赴日留学，至1907年暑期从法政大学速成科毕业¹⁴⁾，其间的大部分时间，居正都在日本，一边求学一边协助黄兴、宋教仁等人处理同盟会会务。因此，在此期间居正与萱野长知已经相识的可能性非常高。

在之后的几年间，萱野长知主要负责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的武器运输、处理工作，以及保护孙、黄两人在日期间的安全。居正1907年离开日本前往东南亚，从事宣传革命及组织与保皇党的

8) 《居正传》，19页。

9) 居正：《梅川谱偈》，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二十六辑。

10) 《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11) 《萱野长知研究》，50页。

12)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一、二篇），《民国丛书》（第一编·25·），1938年，46页。

13) 吴弱男：《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文史资料纪念专辑》，1981年。

14) 《梅川谱偈》，26页。

论战等工作，后来回国发展湖北地区的革命力量。武昌起义爆发后，居正、萱野长知先后于10月14日¹⁵⁾和11月10日¹⁶⁾抵达武汉。阳夏保卫战时，黄兴在汉阳设立司令部，司令部相关人员达上百人之多，其中萱野长知任参谋，居正任督战员，两人共同协助黄兴指挥战斗¹⁷⁾。

1913年9月，随着“二次革命”失败，居正被迫流亡日本，后在中华革命党内任党务部长。在此期间，萱野长知为了促成孙中山与反对“中华革命党”的黄兴的和解而频繁与孙中山接触。在此期间，居正与萱野的交往也十分密切。由于居正参加革命活动，生活极不安定，萱野与夫人侑子又未生育，因此居正将还在襁褓中的第五女居瀛久托付给萱野做女儿¹⁸⁾，足见当时的居正对萱野已经是相当信任。据居瀛久日后撰文《两个父亲》回忆说，儿时家中的中国客人很多，唯独一个拥有“奇怪”姓氏的人经常亲热地逗我，还常带来很多中国的土特产。居正也在《梅川谱偈》中描述说，居瀛久起初不懂中文，也不知居正为其生父，但她却与常拜访萱野家的居正十分亲近，还说“此老伯伯异乎普通之支那人”¹⁹⁾。1919年，萱野长知开始经营一家名为“陶陶亭”的中国餐馆，希望以此作为促进中日同志交流、两国友好的据点。在发起人暨股东的名单上，有日本人34名、中国人14名，其中包括头山满、内田良平、梅屋庄吉、宫崎寅藏等支持过中国革命的日本名流，还有廖仲恺何香凝夫妇以及戴季陶、殷汝耕等国民党相关人士，居正夫妇与居瀛久也赫然在列。耐人寻味的是，当时的居瀛久才五岁²⁰⁾，却与在两国政坛叱咤风云的人物同列。1916年1月，居正受命出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奔赴山东讨袁²¹⁾，萱野长知任顾问。萱野实际上从一年前就开始为筹集军费及武器而奔走，之后又与居正共同在山东筹划、发动起义。在此期间，两位革命的同志共同战斗，关系变得更为亲密。

在萱野与居正两人的交往中，有一件特别值得一提的事。在孙中山担任非常大总统的广东中华民国政府期间，时任总统府参议并负责国民党本部事务的居正曾利用来自萱野长知的援助²²⁾，在广州创办了广东交易所及国民储蓄银行，获利后拨款100万元充当北伐军饷²³⁾，解了孙中山的燃眉之急。这也可以说是两人的友情对革命起到促进作用的例子。已收录于《居正先生全集（下）》、由久保田文次教授提供的萱野收藏的十三件居正来信中有以下内容：

“萱野凤梨先生

今收到日金拾万圆整 桥本先生台照

15) 林济：《居正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73页。

16) 《萱野长知研究》，97页。

17) 苏全有：《阳夏战役中黄兴司令部人员小考》，《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20卷·第2期），2007年4月。

18) 《萱野长知研究》，337页。

19) 《梅川谱偈》，66页。

20) 《萱野长知研究》，159页。

21) 《梅川谱偈》，44页。

22) 《居正传》，156页。

23) 《梅川谱偈》，53页。

民国十年九月十四日 居正”

此外，为商谈设立“广州劝业银行”之事，萱野与居正还互通了若干封信件。其中可以找到的是：收录于《居正先生全集（中）》的“致宫崎、萱野两先生函”和“致萱野先生两函”²⁴⁾，收录于《居正先生全集（下）》的两封“致萱野长知函”²⁵⁾，以及收录于《居正文集》的“致萱野长知告对于开办银行意见函”²⁶⁾，以上所举六封信件均为居正所书，时间在1921年12月5日至1922年1月20日之间，内容均涉及开办银行之事。此外，居正还“复与外人商议，以三千万元合资建立轮船公司”²⁷⁾，可见当时居正对利用外资援助投资发展经济之事十分重视。居正在《梅川谱偈》中写道：“余认为民国十年之广东，乃黄金时代”。

关于两人的其他交往，以及在1937年之后萱野的第二次来华调停之事，笔者会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探讨，本文着重论述以“九一八事变”之后萱野和居正两人的调停事宜。

三、“九一八事变”后中日调停的背景及当时居正的处境

“九一八事变”是近代中日关系的标志性事件，对中日两国关系的走向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九一八事变”是由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关东军少壮军人直接发动，军部参与其事，但在当时的日本政坛，主张强硬的声音也确实占了上风。这在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也陷入了源自美国大萧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农村凋敝，城市失业者倍增，通过对外扩张寻求出路的思潮弥漫于整个社会。但主张“不扩大政策”的若槻礼次郎内阁无法控制关东军在中国军事行动，造成内部对立严重，于12月11日下台。在元老西园寺公望的推荐之下，犬养毅内阁成立。犬养毅曾支援辛亥革命，于1929年以孙中山旧友身份参加“总理奉安大典”，受到国民政府的礼遇。西园寺公望正是看重了犬养毅与国民政府的渊源，才希望犬养毅上台协调，并协调军部与内阁的关系²⁸⁾。犬养毅作为一位中国通，对此事件有着个人独到的观察。他立足于中国政治潮流变化的角度，认为日本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国共和谈、中苏接近，即中国被“赤化”这一日本最不乐见的事²⁹⁾。此外，犬养毅在表明对满洲问题的态度时曾说过，武力征服满洲是行不通的，这可能使国民背上巨大的负担。最好的办法是将满洲的主权给予中华民国，但日本在满洲获得特殊的开发权益³⁰⁾。后来的事实证明，犬养的担心不无道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共产党政权日益发展壮大并最终领导中国；日本国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的确因为战争而生活困难。尽管犬养迫切希望中日两国避免爆发战

24) 《居正先生全集》(中)，347-350页。

25) 《居正先生全集》(下)，754-759页。

26) 罗福惠、萧怡编：《居正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上册415页。

27) 《梅川谱偈》，53页。

28) 渡边孝：《犬养内阁的成立》，《武藏野短期大学研究纪要》(第15辑)，2001年。

29) 黄自进：《犬养毅与九一八事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1996年6月。

30) 时任英人：《犬养毅与满洲事变》，《政治经济史学》二〇九，1983年。

争，但当时的日本国内，人们陶醉在关东军的胜利中，且政友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为平衡矛盾而被推上总裁宝座的犬养毅属于小派系，因此他的政治行动不得不小心翼翼。于是他密谋通过非官方通道，希望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以此作为协调与军部关系的筹码。犬养于上台后第三天的1931年12月15日选定萱野长知赴中国谋和³¹⁾。

反观当时的中国政治，国民党内派系争斗，不利于形成统一的对日政策。同时，居正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的处境也是非常艰难的。孙中山去世后，居正一面主张反共清党，一面也积极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他同邹鲁、谢持等“西山会议派”人士一起，通过发表公告、编辑报纸等方式，极力揭露蒋介石的独裁行为。但在那样一个动荡时代，掌握军权的人便能掌握政治。作为文人政治家的居正自然无法撼动蒋介石的地位。1929年冬至，蒋介石派人在上海诱捕居正，居正在看守所的生活持续了一年³²⁾。经过居正夫人钟明志的努力斡旋，甚至当着蒋介石的面直接要求放人，居正终于获准可以外出租屋居住。此时，居正虽与家人团聚，但由于受到军法处监视，实际上等同于被软禁。随着反蒋力量的集结以及“九一八事变”后要求团结抗日的呼声高涨，宁粤和平交涉进程加快，居正于1931年10月间“复其自由”³³⁾。

然而，出狱后的居正“忽病伤寒，入虹口美国疗养院，仍属日本熟医生吉住主治”³⁴⁾。

据《居正文集》的“致萱野长知告对于开办银行意见函”³⁵⁾：

“... ..

至弟病状，虽稍减退，然疲乏已极，终日仰卧，已延吉住先生诊视。

... ..

居正 元月二日”

另据《居正先生全集（下）》有下一封居正“致萱野长知函”：

“凤梨（我）兄阁下

弟病较除 定明日出院转地休养之法尚俟中孚兄来决定

此次得兄介绍吉住先生 只三周间疗治 霍然病已 古之良医不是遇也

弟将登广告以谢之 惜各报馆因抵制遗风不 登日本人广告

弟将求吾党民国日报登一较短期广告或可稍利知注奉闻并希

兄为致函吉住先生 时代为致谢此颂

31) 岩崎荣：《犬养密使：萱野长知的日志》，《中央公论》，1946年8月。

32) 《梅川谱偈》，68-69页。

33) 《梅川谱偈》，70页。

34) 同上。

35) 《居正文集》（上），415页。

大安

弟 正 一月廿六日”³⁶⁾

由以上两件信函可以判断，居正在1931年出狱后问诊相熟的吉住医生，实际上是缘于1922年³⁷⁾ 萱野长知的介绍。此时的中日两国关系虽不稳定，国民感情也并非亲近，但这些都无碍两人的友情。身体恢复后的居正一面参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改组、团结工作，一面与犬养毅派往中国的密使、同时也是其老朋友的萱野长知进行接触，为促成“九一八事变”和平解决而奔走。

四、萱野长知的中国观及其以密使身份与居正的交涉

《萱野长知研究》的作者崎村义郎在该书的前言中这样评价萱野长知：“从事支援中国的革命活动的日本人很多，但大部分都是抱有为日本谋取利益的目的，或带着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去‘指导’中国人的革命的思想。像萱野先生那样‘纯粹无垢、无私无欲’³⁸⁾地支援中国革命的人，除了先生的好友宫崎滔天之外恐怕也不多了”。萱野在《革命评论》创刊号上谈到过他支援中国革命的原因，“支那与俄国这两大专制国家对世界和平来说是巨大的威胁，为了世界的和平及文明的发展，必须通过革命改变这两个国家的政体”³⁹⁾。萱野自援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开始，直至孙中山去世，始终如一支持革命，并且与中国革命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这一点来看，他相对其他日本大陆浪人来说，的确是比较纯粹地追求中日和平共荣、和其实现自由民权的理想。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否认萱野的相关活动有某种为日本谋取利益的色彩。他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尊重中国对满洲的民族主义要求，但同时中国也应当在东北地区给予日本特殊权益。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一切缘于他所宣扬的以“王道”取代“霸道”的对待中国问题的“大亚洲主义”。总而言之，他的这一思想与他积极推进中日和平交涉工作是有重要关联的。

依据《犬养密使·萱野长知日志》的记述，以及《居正先生全集》下册所收录的“由马伯援携交萱野函”、“致陈中孚并代向萱野致意函”、“萱野致犬养健密电十五则”的内容，从1931年12月21日萱野抵达上海至1932年1月8日离开中国，萱野长知与居正在此期间的交涉活动的相关内容见如下表格：

36) 《居正先生全集》(下)，776页。

37) 根据信封上邮戳判断为1922年1月27日从上海寄出。

38) 《萱野长知研究》中日文原文：“純粹無垢、無私無欲”。

39) 《萱野长知研究》，47页，有删减。

时 间	内 容
1931年12月21日	萱野乘船抵达上海； 居正前往码头迎接萱野，并负责安排萱野一行 ⁴⁰⁾ 的住宿。
1931年12月22日	萱野获知居正将前往南京出席国民党大会。
1931年12月23日	萱野收到居正电报让其立即前往南京。
1931年12月24日	萱野早上到达南京，居正夫人等前来迎接； 萱野与居正等人共同拜谒中山陵； 晚八时，在居正等陪同下前往拜会孙科，并由居正向孙科说明解决满洲问题之方案 ⁴¹⁾ ，孙科表示将此事交由居正负责。
1931年12月25日	萱野在给犬养的电报中称：“居正知道一旦赴东北负责停战工作，极有可能背上卖国贼的骂名，但他为顾亚洲之大局依然愿意赴任” ⁴²⁾ 。
1931年12月27日	正午，居正主持萱野欢迎宴会。
1931年12月29日	深夜十一时四十五分，萱野出发离开南京复往上海。
1931年12月30日	萱野于早上八时抵达上海，将居正等人送给犬养先生的礼物打包。 并向犬养方面发去电报，表示居正正在等待我方回电，已经做好了随时前往满洲的准备 ⁴³⁾ 。
1932年1月1日	萱野终于接到东京回电。犬养方面让萱野告诉居正，希望他于10日左右前往满洲，日方也将尽量派重要人物前往。 居正还在南京，萱野委托徐瑞霖前往南京将此消息告诉居正。
1932年1月2日	萱野向东京报告说，居正早上到达上海，预定于9日出发去东北，国民政府向银行团贷款六千万元作为居正在东北的活动经费 ⁴⁴⁾ 。
1932年1月3日	居正与萱野面谈时说，已经将满洲问题的交涉内容告知汪兆铭。汪主张在政治会议上进行讨论并公开与日方交涉。居正认为此行不可，将先征求何应钦、朱培德两人的意见。
1932年1月5日	萱野向东京报告，表示交涉十分顺利，中方将于6日在政治会议上议定“东三省行政官府”之事。并再次说明居正预定于9日秘密出发，13日到达奉天。下午1时，萱野突然接到犬养招其立即回国的电报。萱野感到不安，因此向居正发去电报让其延期前往东北。 居正托马伯援致函与萱野，希望一方面由萱野向犬养通报交涉情况，另一方面由外交途径，这样把握更大 ⁴⁵⁾ 。
1932年1月6日	居正致陈中孚函，告知其哲生（孙科），友仁（陈友仁）均赞成一面通过外交途径，一面通过非正式管道进行交涉。他认为“萱野返东梗有无上好处”，依然对和平抱有希望。 居正还通过此函向萱野致意，表示“本拟赶于七日晚赴沪相送，恐其间尚有其他事，故不（先）离身，十二日之行恐尚谈不到也” ⁴⁶⁾ 。

40) 同为犬养毅心腹的金子克己、松本藏次两人作为萱野的助手同行，负责联络工作。

41) 根据萱野向犬养发出的电报可知当时的解决方案是：一、为确立满洲政权，组织以居正为主任的委员会，一切悬案均委以居正权限，在当地交涉。二、对张学良给予适当处置。三、任命居正的同时，双方即刻停止军事行动。

42) 《犬养密使：萱野长知的日志》，《中央公论》1946年8月号，85页。

43) 《犬养密使：萱野长知的日志》，《中央公论》1946年8月号，86页。

44) 《居正先生全集》（下），812页。

45) 载于《居正先生全集》（下），767-772页。

46) 载于《居正先生全集》（下），790-792页。

萱野长知与居正是两位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的人物，且两人私交甚好又企望中日和平，这本应有利于和平调停工作的成功。但由于时局所掣肘，两人理想中的中日和平未能实现。若究失败原因，萱野与居正两人虽然分别代表日中两国政府，但他们并非政策的决策者而仅仅是协调人。

居正作为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有一定影响力，国民党南京四届一中全会改组后当选党中央常委，及司法院副院长兼最高法院院长⁴⁷⁾。居正也得到了党内众多人士的支持。如当得到消息说犬养毅的密使萱野长知将前来中国，希望与居正进行和平交涉之后，时任行政院长的孙科即“拨付了一万元国币与居正先生招待萱野”⁴⁸⁾，再如“在京要人过半”⁴⁹⁾均参加了居正主持的萱野长知的欢迎宴会。但其中很多人有可能是抱着与辛亥以来的老同志萱野叙旧的目的前来与会。而从全局的角度看，此时的国民党各派势力依然是以争夺领导权为中心，且是战是和意见不一。主张抗日的外交部长陈友仁曾发公函与南京日本领事馆，表达对萱野长知作为犬养毅代表来华活动的不满⁵⁰⁾。反观萱野长知，作为首相的密使，发给首相的电报竟然轻易地被主张侵略的书记官长的森恪截获，可见作为首相兼外相的犬养毅，无法控制住内阁及军人的活动以致出现“二重外交”，最后导致调停失败。

在与萱野长知交涉的同时，居正并没有完全放弃武力抵抗日军的心理准备⁵¹⁾，但凭着对犬养毅的期望以及对萱野的信任，居正在忙于整合国民党内部事务的同时，依然全力配合萱野的调停活动，甚至不顾可能会背上汉奸的骂名。这些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两人的友情在调停活动中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方面对犬养毅及萱野长知的信任也是促成和平调停工作得以进行的原因之一。但随着交涉的失败，以及以此为导火索的“五一五事件”的发生，对萱野、居正两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犬养毅的被杀使居正不再对中日和平抱有希望，而转为全力抵抗日本。萱野也失去了最大的靠山，对他本人的中日和平企望形成了巨大的打击。但是不管中日是和是战，萱野长知与居正的私人友谊依然存在。以下为“由马伯援面致萱野函”一封：

“萱野吾兄

□在东亚大势险恶日增 吾华国首罹其殃

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惟兄素明此理 将何以教我

前寄相片一枚 收到否 令爱近状为何 诸托马君面罄此矣

冬安

47) 《梅川谱偈》，71页。

48) 邹鲁：《犬养毅确曾致力中日和平》（澄庐文选），时间不详，《居正先生全集》（下），852-853页。

49) 《犬养密使：萱野长知的日志》，《中央公论》1946年8月号，85页。

50) 『萱野の行動に関し陳外交部長不満表明について』（昭和7年〔1932年—笔者注〕1月6日，由日本驻南京领事上村发给犬养外务大臣），《居正先生全集》（下），837页。

51) “（1931年——笔者注）12月24日，阎锡山、居正、程潜等16人联名向会议（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笔者注）提出选拔15万劲旅死守锦州、防止日寇南侵的议案”，《居正传》，201页。

居正□□ 十二月十三日⁵²⁾

虽无法准确知道居正写此信件的具体年份，但可以获知即使是在东亚局势动荡之时，两人也并非站在侵略与被侵略国家的对立面上，而是将“东亚大势险恶日增之人”置于对立面。此外，居正还不忘关心“令爱”，即他的亲生女儿居瀛久之状况，足见在政坛中历经风雨，摸爬滚打数十年的居正内心深处人性的一面。

五、结 语

萱野长知与居正虽因共同政治目标而结缘，但两人的交往并不仅仅局限于在政治活动中的合作。萱野长知支援中国革命的动机本身就相对单纯，且是“重信义，以诚实为宗旨”⁵³⁾之人。同时，居正认为对待朋友要“知礼守义”、“勤善规过”⁵⁴⁾，强调“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⁵⁵⁾。关于人与人相处他还说过，“‘诚’为‘修’的出发点，也就是‘修’的基础”，“互有交换意见和接触的地方，应该要以诚接物，以诚待人，以诚克己，这就是修的意义，为达成修己爱人之目的，我们必须诚意修身”⁵⁶⁾。也就是两人的这一大共性，使得无论局势如何变幻，两人的友情依然如故。宫崎滔天说浪人应该“无恒产而有恒心”，即不求有固定的收入，但要有一颗为天下或自己的志向而努力奋斗的恒心。萱野长知的行为即符合这一特点。他与宫崎滔天二人共同为中国的革命而全身心的付出，贡献巨大。

居正与萱野长知——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两个人，在复杂的两国关系及国际环境的影响下，依然能够忠实于最单纯的友情。无论是在为中国民主政权的建立而奔走之时，还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为事件和平解决而协调之际，拥有共同的理想与目标的两人，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为中日关系作出一些贡献。而终究在时代的大背景之下两国关系破裂，两人也无力改变这一切。

通过对萱野长知与居正的交往的研究，也让笔者思考“历史的发展究竟是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还是围绕人的环境起着决定性作用”⁵⁷⁾这一问题。左传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说法，在研究处于不同“环境”中的“人”的关系之时，容易“因为对象人物所属的国家及背景不同而抱有成见或偏见，以至发生认识上的误判”⁵⁸⁾。与其他中日两国人物关系相比，萱野长知与居正的交

52) 载于《居正先生全集》(下)，773-774页。

53) 《萱野长知研究》，336页。

54) 居正：《对省垣中学以上员生的训话》，载于《居正先生全集》(上)，389-392页。

55) 同上。

56) 居正：《居正六月十五日在武汉对临大先修班学员讲话》，载于《居正先生全集》(上)，401页。

57) 山田辰雄：《近代中国人名辞典》绪言，引于我的导师陶德民教授：《作为“人学”的东亚文化交涉学—基于史学立场的一个畅言—》，《东亚文化交涉研究》第5号，2012年2月。

58) 《作为“人学”的东亚文化交涉学—基于史学立场的一个畅言—》，7页。

往也固然包含普遍性，但更多能够看到的是特殊性——即抛开政治的纯粹友情。这一特殊性可以启发我们找到更好地处理中日两国关系的方式。